

何国华 著



陶行知教育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行知教育学/何国华著. - 3 版.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9

ISBN 7-5361-0673-4

I. 陶… II 何… III.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636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68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3 版 1997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18000 册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序一）

毛礼锐

我一生从读书到教书，受惠于师友者多矣。陶行知先生是我最难忘的恩师，也是我最崇敬的中国现代大教育家之一。他的学识与为人，随世推移，其光辉总是光彩照人，其伟大至今世人共识。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不仅在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不朽于史，而且教育和熏陶了数辈英才，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陶行知先生，是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土壤上的大教育家。尽管他受过西洋教育特别是美国杜威等人的直接影响，然而他毕生追求和努力奋斗的目标，以及从事研究、探索、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则是完全服务于中国人民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献身教育，大公无私，忧国忧民，矢志不渝，勇于实践，勤于探索，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是值得中国人民骄傲，值得人们继续学习与研究的。

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理论，来自他的教育实践与实验，来自他对当时中国各家各派教育实践的总结与检讨，来自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所以，陶先生的教育学说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活的。他不生搬硬套洋货，更不抄袭前人旧说，其教育学说是来自艰辛探索的实践与实验，并经过实践与实验反复检验与修正，因而能不断进步，历久弥新。二是全的。所谓全，就是指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体系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各个领域，诸如教育哲

学、普及教育、幼儿教育、儿童教育、成人教育、扫盲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工读教育、科学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家庭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革命教育、军事教育，乃至教育制度、学校制度、教育改革、教育评估、教育管理、教育实验等等，都有精彩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三是创造性。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之所以在当时影响巨大，独树一帜，乃是它本身独有的与常人和其他流派不同的创造性。陶先生善于从事教育实践和教育实验，并在实践与实验中总结与研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博采百家，超群脱俗，以实验为根据，以科学为准绳，以适应民族需要为鹄的。所以他在实践与实验之中不囿于已有的经验，不拘于前人的成见，不止于既得的成就。他走出大学课堂和书斋，不满足于因循相袭的正规化教育，竭力探索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论，并科学地指导中国教育实践。今天，研究陶行知教育学说，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是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何国华同志长期着力于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研究工作，并在华南师范大学开设陶行知教育学说探讨的专门课程，可谓颇有功力的了。他的新著《陶行知教育学》，是在他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基础上完成的。该书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陶行知教育学说的各个方面，既注意了陶行知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特点，又突出了陶行知教育实践与实验的特点，同时又把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研究与当今我国教育科学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人们思想的独到见解。这是他继1986年出版的荣获全国教育理论读物优秀奖的《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究》专著后的又一力作。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颇有学术价值的教育史研究著作，并以此作为该书的弁言。

1989年11月10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小红五楼

具有中国教育思想（序二）

王 越

在中外教育史上，有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出现于 20 世纪的中国，这就是陶行知先生。

他终年仅 56 岁（1891 - 1946），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求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生；为开辟人民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为创建适合时代前进的教育理论而呕心沥血。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是不朽的。

陶行知站在时代的前头，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显示出科学的预见性和高度的创造性。

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外患严重，忧时之士，有的主张发扬传统为立国之本；有的则认为模仿外国，才能转弱为强。在教育方面，表现为旧学与新学之争。在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发表文章，既抨击“沿袭陈法”，亦反对“仪型他国”，而主张下艰苦工夫，自辟蹊径。以当时的学制改革来说，他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我国的学制，经过仿效日本，取法德国，又转而模仿美国，学来学去，总是四不象。因此，他主张采取科学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外国的经验要有所选择，以期制订出一个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的学制。更可贵的是，他认为“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我们未尽到责任”。他本着这种宏大的心愿努力开展平民教育，到 20 年代后期，他积极从事于乡村教育。至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他明确指出，政治上的革命与教育的革命不能分离，必须同时并进。这

时，共产党人与之合作，旨在培养师资骨干，扎根农村，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及其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共产党人恽代英曾致函毛泽东，认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里搞一搞”。可见陶行知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共产党人不谋而合，可以说是时代的号角。

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运动，又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美国的杜威教授，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并提倡实验主义。陶行知与胡适都曾受业于杜威。杜威来华演讲，陶胡两人任翻译之责，广为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要旨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上学”。陶行知依此从事教育实践，不久即发现杜威的学说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乃把它倒转过来，而建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说明主张以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生活要求作为教育的根据；在方法上提倡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来指导学习；强调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使他能想、能干、能看、能谈，并要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能在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要解放他的时间，不使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而让他有时间消化他所学，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等等。陶氏反对脱离社会需要、死扣书本、理论脱离实践的教育，也反对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尚待解决。例如，人口增殖过快，教育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尚有颇大的距离，都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两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民族的盛衰、国家的荣枯。以人口问题来说，20年代美国的山格夫人来华，宣传节制生育的重要性，收益甚

微。二三十年代陶行知鉴于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膨胀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乃于1931年著文指出：中国要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是无疑的。但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致“把财富都吃光了”，因此，“多生主义”是中国人民贫困原因之一（在这儿陶氏没有忽视封建剥削及帝国主义剥削之为害）。他以我国的土地、资源生产力、经济状况的统计数字为根据，说明人口与生活、人口与教育水平的关系，并郑重指出，多生与贫穷落后、多生与文盲众多，密切相关。因此，他主张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要注意到少生孩子，教育者的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在1940年，他曾对重庆育才学校的教职员工，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要求。陶氏于此还提倡“五生世界”之说，供人思考。建国后50年代有识之士马寅初与钟惠澜等，敲起警钟，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但忠言逆耳，横受压制。二三十年间，人口膨胀，今日竟达11亿之多，这个沉重的包袱还愈来愈重，使人寝食不安，他更使人怀念陶行知等人的远见卓识。

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教育为本。陶氏说过：“做一个现代化的人必须取得现代化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化的问题，并以现代化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化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钥匙便是活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普及教育之最大使命，便是把这个钥匙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陶氏毕生之主要精力，便是以身作则并组织同志为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而奋斗，艰苦卓绝，感人至深。但在解放初期，竟因批判武训而株连陶氏，使研究陶氏学说，成为禁区。到了80年代初，陶氏得到平反，他的思想很快受到重视，“陶研会”的组织遍于全国各地，《陶行知全集》亦已问世。这对我国今后的教育改革和科技发展，

将发生积极的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经济力量强弱的竞争，是社会生产力高低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要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普及教育。例如西方在 1797 年已制成第一台蒸汽机车，但掌握蒸汽机车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还有待培养，直至二三十年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蒸汽机车转化为生产力。于此足见科学技术有赖于教育而发挥其效用。陶氏于 1930 年和 1931 年之间，考察日本的国情，得到一个结论是：日本之强在于科学发达。陶氏于 1931 年著文指出，中国的第二条出路是教人“创造富的社会”，要创造富社会，有个重要途径，就是“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和“工业化的农业”。他郑重提出：“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我们要创造合理的工农业文明，必须注重有驾驭自然力量的科学。”因此，他主张科学教育要注意自然科学的训练，那种只读书籍、听科学讲演而不做实验的，“便是洋八股而非真科学”。总的来说，陶氏这方面的主张与我们实现四化的要求基本上一致。

如上所述，陶氏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中肯的意见，可资参考。他高瞻远瞩，大力鼓吹职业教育，积极提倡教育与生活劳动相结合，而且付诸实践，取得了成效。他侧重师范教育，对乡村师范教育极端重视。他毕生的信念是培养优良师资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以发展教育，作为兴邦之本。此外，他对幼儿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道德教育、体育、美育，以及学校管理、体育卫生等等，都有其创见，内容丰富，历久弥新。

当然，陶行知不是“一贯正确”的教育家。他在初期，曾有过于天真、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在不断实践、不断修正错误中，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如上所述，他曾推广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由于实践过程中，觉察此说之不可信，因而幡然改图，另创切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学说。此外，他在

青年时代，曾崇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把自己的原名（文浚）改为知行。通过实践，通过科学知识之掌握，乃推翻王说，而于1929年正确地掌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一条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原则，后再改名为行知。30年代后期，他前往海外，宣传抗日救国，并在伦敦瞻仰马克思墓，赞叹马克思的宏论。他自己更明确指出，“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要为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进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需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这一段话具有唯物辩证法的要素，显而易见。1943年陶氏进一步以诗歌的形式说明矛盾统一、从量变到质变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定律。他掌握的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在中国救亡运动中，在教育实践中，在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中，曾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陶行知以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自动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视高官厚禄如敝屣，摩顶放踵，含辛茹苦，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团结同志，办平民教育、乡村师范、工学团、科学教育。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都是在困难丛生，阻力重重的环境中百折不挠，坚持下去。他的最高理想是“生活教育要解放全人类”，他说过，“因为它（晓庄师范学校）爱人类，所以它爱人类中为数最多而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它爱中华民族，所以它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他主张“爱满天下”，但是，他对于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对于反动政府的压迫，却坚决斗争，毫不妥协。他在三四十年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一往无前，视死如归，表现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品质。毛泽东同志称陶氏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同志颂扬他可作万世师表，陶氏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我国人民在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正在为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勇前进。有关教育建设的伟大事业，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作为指针，陶行知先生的进步教育宏愿，可为实现这个指针作出贡献。

本书作者何国华副教授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于80年代初，曾积极参加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的创办工作，曾任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秘书长，他早年崇敬陶行知先生并笃信其学说。“四人都”垮台后，深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他毅然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宣扬陶先生的文章。80年代以来，他更加努力学习陶先生著作并积极笔耕，宣传其思想，他写的这本《陶行知教育学》，对于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及其在理论方面和教育实践方面的卓越贡献，作了纲举目张的阐述。这是他继1986年出版的、曾于1989年全国首届教育理论著作评选中荣获优秀奖的《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究》专著后的又一力作。这一颇具特色的教育专著，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确有参考价值。是为序。

1989年10月写于暨南大学

目 录

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 (序一)	毛礼锐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序二)	王 越
第一章 生平教育活动	(1)
第二章 教育思想特点	(14)
第三章 哲学政治思想	(26)
第四章 生活教育理论	(40)
第五章 普及教育	(53)
第六章 幼儿教育	(71)
第七章 成人教育	(83)
第八章 职业教育	(100)
第九章 师范教育	(111)
第十章 高等教育	(125)
第十一章 教师修养	(137)
第十二章 学校管理	(151)
第十三章 道德教育	(167)
第十四章 体育卫生	(193)
第十五章 美育理论	(207)
第十六章 劳动教育	(228)
第十七章 科学教育	(241)
第十八章 创造教育	(260)
第十九章 人才教育	(279)
第二十章 家庭教育	(294)
第二十一章 教育评估	(311)
第三版后记	(324)

第一章 生平教育活动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大众诗人、革命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儿童。他从青年起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为了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提高民族的素质，探索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道路，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历尽种种艰难险阻。他对祖国独立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留下的四百多万字的教育遗著，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宝贵的财富。

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安徽省歙县人，生长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农村”。家境清贫，幼年接受父亲和塾师的教育。14岁那年，入歙县县城崇一学堂。肄业时，曾在学堂楼上卧室墙上题词：“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贡献来。”该校为教会学校，两年后，校长唐进贤（英国人）回国，致学校停办。他为了学医，即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肄业，三天后，由于校方对非基督徒学生在选课、学习方面的明显歧视，他愤然离校。他返回徽州攻读了一年英文。1909年，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肄业。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到徽州，曾与余德民等人一起在屯溪阳湖余家庄发动起义，事败。辛亥革命后，陶行知被选为州参议会秘书，工作半年后，又回到金陵大学中文科学习。由于同学协助和当局信任，他开始担任该校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积极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他勉励同学要

“及时努力，使中华民族大放光明于世界”。这时，他深信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深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至1934年7月16日起，又改名为“行知”。

1914年6月，他完成金陵大学第四年学业时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共和精义》，充满了民主革命思想。同年8月，他在父母和亲朋帮助下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与孙科为同校同学。一年后，陶氏获得政治硕士学位。在学期间，曾任学生会干事。由于坚信“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能有共和制的存在”^①，他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教育科学，深受杜威教授（1859-1952）和孟禄教授（1869-1947）的器重，取得了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与胡适为同校同学。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自美国学成归国，即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授兼教务长，东南大学教授兼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当时的教育科包括教育、心理、体育三个学系，即相当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师范学院）、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南京安徽中学校长等职务。

他在南京高师任职的第二年（1918），曾积极提出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的主张，即以“教学法”取代“教授法”。他指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这与今天我们所强调的给学生以“猎物”不如教之以“猎枪”，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含义是一样的。他当时提出的上述的改革主张，曾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及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南京高师学堂才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1918年，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的主张。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

上最早倡导职业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

陶行知于 20 年代初曾为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而呐喊。1920 年，他在南京高师继续进行改革，就包含有提倡男女同校和招收女生等措施。

他对我国于 1922 年 11 月颁布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又称为“六三三四制”）曾作出一定的贡献。1921 年 10 月 29 日，陶行知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务长、教授孟禄博士（他留美时的老师）到广州进行科学教育实际情况调查，他担任翻译。这是陶行知生平第一次来到祖国南大门广州市。同年 11 月初，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代表，被选为正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学制”起草委员，留在广州参加讨论和制订改革学制新方案的工作。

1926 年 7 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1921 年，南京高师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职，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工作。同年 8 月初，他迁家至北京。为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他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平民周刊》，奔走了 10 多个省市，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

1926 年，陶行知与赵叔愚教授开始提倡乡村教育。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发表的《全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85% 的人口在农村，只有教育向农民普及，为改造农村服务，中国才有光明前途和希望。他决心“筹备一百万元资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7 年 3 月 15 日，他与赵叔愚一起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1928 年和 1929 年，他在浙江萧山市和江苏淮安县创办了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和新安小学，积极从事改造农村人才的培养工作。1929 年 12 月 4 日，他接受

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科学博士的荣誉。

晓庄师范是一所新型的学校。他大力破除硬灌死读的旧传统教学，大力倡导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提出教育要与社会实际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做三者要密切结合。例如，该校入学考试，除考语文、数学、常识三科外，还有开荒、五分钟演说两门考试。全国 24 个省都曾先后派人前来参观学习，外国许多教育家也慕名前来参观。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教授（1871—1965）于参观后写道：“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的人知道！”^②

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逐步感到从自己老师杜威所得的所谓“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一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社会中行不通，便给它“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把自己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教育试验和探索的文章，选编成《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于 1928 年出版问世。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为了探讨挽救国家危难的教育理论，不惜抛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当时月薪为 400 个银元），脱下西装革履、长袍马褂，走到贫困落后的南京郊区农村，穿草鞋，挑大粪，与师生同甘共苦。他不愧为创造新教育体系的伟大先驱。

陶行知开创的乡村师范教育运动，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深受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的重视与推崇，他就此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里搞一搞。”^③

1930 年 2~4 月期间，陶行知同情和支持晓庄师范师生参加为反对日本舰队开入长江和支援南京下关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

大罢工示威游行。同年4月7日，晓庄师范竟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封闭，还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他即逃往上海，幸免于难。这期间，陶行知寄居于静安寺路友人家中，从事选编《知行诗歌集》。由于特务追捕日紧，他移居虹口内山书店。同年10月，他在书店经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的协助下，东渡日本避难。

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于四川北路，受到上海《申报》（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总经理史量才的掩护，被聘为该报总管理处顾问。陶行知对办报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史量才很重视，并使《申报》转向进步力量和救亡运动的一边。1934年11月13日史先生被戴笠的特务暗杀。陶行知用笔名在《申报》不断发表杂感之类文章，主张抗日救亡，痛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陶行知逃亡日本时，认真地对日本进行考察，使他看到日本工业发达，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强，强在他科学发达”。这时，他接受史量才巨款资助，作为提倡科学教育的基金。他遂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向儿童和工农大众灌输科学知识。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和“儿童通讯学校”，还主编了《儿童科学丛书》。陶行知极其重视科学教育，他强调每个中小学教师都要懂得一门自然科学，否则就不配当教师。

同年9月，他在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华教育界》杂志上以何日平为笔名，发表长达2.5万字的论文——《中华民族的出路与中国教育的出路》，他剴切指出中华民族的出路与中国教育的三大出路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他强调现代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但由于农民的“多生主义”造成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致把“财富都吃光了”。为此，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最根本任务是少生小孩子”，而中国教育者的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

由于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次年又发生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抗日救亡，1932年9月15日，陶行知在上海与宝山交界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陶先生很善于命名，把当年南京晓庄师范的所在地原名小庄，改名晓庄，其寓意为太阳出来了。）山海工学团的“山海”有两层意思：一是地处宝山及上海市之间；二是九一八日本侵占了东北，一二·八又打到了上海，山海关早已丢失了，取名山海，语意双关，志在实施国难教育，还我河山！“工学团”的寓意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社会、学校、工场打成一片，普遍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以期团结民众，改造社会，收复失地，保卫国家。

1934年2月16日，他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创刊。1934年，他在该刊11期发表文章，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毅然宣布把自己名字由知行改名为“行知”。他在这时期出版的专著有《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知行诗歌集》等。是年，还编印了《老少通千字课》（1~4册）。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陶行知把教育作为民族解放斗争武器，1936年1月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提倡国难教育运动，制订了《国难教育方案》，以推进大众文化和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为奋斗目标。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陶行知把“国难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提出以“在战时组织中进行教育，组织民众起来参加战时教育”为奋斗目标。《生活教育》杂志也于这时改名为《战时教育》出版。

1936年4月底，陶行知应邀出席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因国民政府拒发出国护照，他遂取道香港再设法出国。同年4月23日，他离上海赴广州，在途经广州时，应各方之请留了下来，进行学术讲演活动，宣传抗日救国